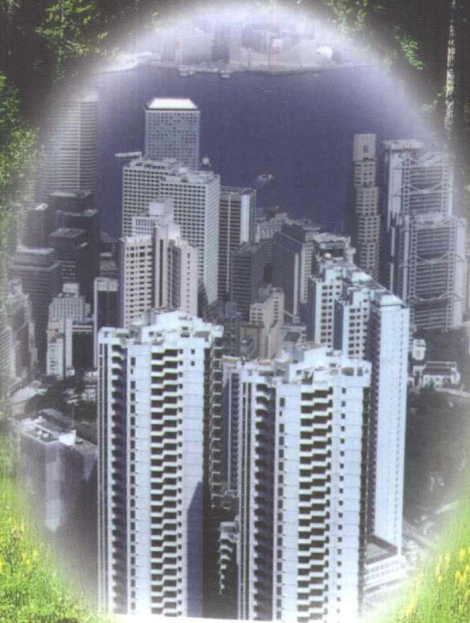




史健玲 著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深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42

3. 17. 74
117

[REDACTED]

[REDACTED]

题名见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韩宝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5

ISBN 7-5004-3459-6

I. 语… II. 韩… III. 人类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539 号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宗 和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发展观的特征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去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也无止境扩大，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科学家们不断发出警告：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盲目开发，人类所面临着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水源危机以及粮食危机正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深度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的忧患意识，人类开始对自然观和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终于认识到自身在将来有“不可持续”的可能。由此人类开始摒弃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传统发展观，开始以发展的眼光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把环境问题仅当做一个污染问题，到把环境问题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天，“可持续发展”已在全球达成高度共识。

如何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任务。1992 年世界环境保护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文件《21 世纪议程》，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快就予以积极回应，制定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计划，并付诸实际行动。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的统计资料显示，到 1997 年 4 月，全球已有 64 个国家的 1812 个地方政府出台并着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年3月，中国在上世界上率先编制完成了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它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履行全球《21世纪议程》等文件方面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已开始全面付诸行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全国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涉及到自然、经济、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现在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吉林、四川、黑龙江等省市制定完成了21世纪议程，部分市、县也已积极行动起来。为积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已建立国家级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26个，省部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42个，遍及全国22个省市。我国政府正在通过支持地方政府制定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将城市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深圳作为一座高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应努力抓住时代机遇，率先实现以城市为重要内容的地方可持续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赋予她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她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探索先进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一个有效率的发展模式显然不仅是指模式的短期效率，更指经济、环境并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效率。所以深圳应考虑如何在遵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制定出富有特色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分解成符合国家总体战略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富有成效的城市具体实施方案。

深圳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科技与经济等多方面，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和关键性的谋划，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因此，结合深圳经济特区的特点不断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对于实施深圳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正是针对这一客观要求，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依据《中国21世纪议程》，以城市现代化建设为背景，运用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原理，在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深圳人口、资源、环境、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深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具体包括：（1）从国内外地方和城市 21 世纪议程活动的趋势为深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宏观背景条件出发，提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应努力抓住时代机遇，率先实现以城市为重要内容的地方可持续发展；（2）从深圳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构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3）从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角度，建立促进深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机制；（4）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深圳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构想；（5）从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问题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与价值底蕴”的思考，来把握深圳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真谛。

本书是深圳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由于作者水平和学科视野的限制，难免有偏颇、失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2 年 2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是深圳的必然选择	(1)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内涵	(1)
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
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	(12)
第二节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0)
一、中国有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0)
二、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	(23)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是深圳的必然选择	(27)
一、深圳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27)
二、深圳可持续发展的背景条件	(28)
三、深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分析	(29)
四、深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30)
第二章 深圳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	(36)
第一节 人口现状与特点	(36)
一、世界人口的发展与特点	(36)
二、我国人口增长的特点	(43)
三、深圳人口现状和特点	(46)
第二节 深圳人口规模控制	(50)
一、深圳的人口规模	(50)
二、人口规模的控制	(51)

第三节 人口结构的优化	(53)
一、深圳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53)
二、劳动者就业结构的调整	(55)
三、人流的国际化趋势	(56)
第四节 人口素质的提高	(56)
一、人口的身体素质	(57)
二、人口的文化素质	(59)
第三章 深圳的资源开发战略	(74)
第一节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74)
一、自然资源的分类	(74)
二、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态势	(76)
三、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85)
四、对深圳面临自然资源问题的分析	(86)
第二节 深圳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87)
一、水资源危机与对策	(87)
二、土地资源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101)
第三节 深圳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113)
一、令人担忧的海洋	(113)
二、深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122)
第四节 深圳能源资源利用的对策	(133)
一、能源危机对世界的困扰	(133)
二、深圳能源资源利用的现状和对策	(145)
第四章 实现深圳环境可持续发展构想	(152)
第一节 环境污染的预防与治理	(152)
一、环境污染对全球的危害	(152)
二、深圳环境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	(163)
第二节 构建垃圾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模式	(183)
一、城市垃圾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183)

二、西方循环经济的实践	(193)
三、构建深圳市垃圾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模式	(200)
第三节 创建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生态城市	(217)
一、创建生态城市是国际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217)
二、对深圳建设生态城市的思考	(223)
第五章 深圳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观	(235)
第一节 环境伦理观	(235)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再思考	(235)
二、倡导环境伦理	(239)
第二节 用生态技术进行可持续生产	(254)
一、生态技术及其特点	(254)
二、世界可持续产业发展趋势	(257)
三、深圳可持续产业发展对策	(276)
第三节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消费方式	(290)
一、物质消费型生活方式	(290)
二、人类消费生活方式的变革	(300)
三、深圳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	(313)
主要参考文献	(317)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是深圳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最新的发展观，它是人类经过实践探索和理性反思后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观念更新的一种表征。可持续发展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逐步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成为当今社会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内涵

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观是工业文明受到严峻挑战、人类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的产物。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速度，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不断总结经验、超越自我，凭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财富，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出现了一些新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频频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

最突出的是环境、资源与人口问题。由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其中震撼世界的是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一）马斯河谷事件，发生于 1930 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二）多诺

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三）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市；（四）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1962年英国首都伦敦；（五）四日市哮喘事件，发生于1941年日本四日市；（六）水俣病事件，发生于1935—1965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七）骨痛病事件，发生于1955—1972年日本富士山县神通川流域；（八）米糖油事件，发生于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等地。这些主要是由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公害事件，导致许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身体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安全和健康的生活，掀起了反对公害的环境运动。与此同时，随着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人们基本生活条件大幅度提高，于是导致世界人口急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是资源的短缺。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北贫富差距触目惊心，消费主义膨胀、毒品、国际间的恐怖活动、艾滋病蔓延，都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唯物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等等内在倾向，必然造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分裂与动荡，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很显然，这些世界性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界限，也大大超越了地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这是对全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也是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人类发展观的演变和更新。追寻历史的足迹，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持续发展酝酿初期。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一些关注生态、环境、资源对人类生活造成影响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观点。前苏联学者维尔纳茨基是生物圈学说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系统地论证了生物圈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他在《自然主义者的沉思》一书中强调指出，人是地球的公民，“他可以，也应该，从新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行动，不仅从单个

个人、家庭、种族、国家或国家联盟出发，而应从地球的角度出发，从他与之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并不可能脱离的那一部分地壳出发”。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莱奥波尔德认为，人是“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员，人在自然界的恰当地位，不是一个征服者的角色，而应当是大地（自然界）共同体中一个好公民的角色。他在1933年发表于美国《林业杂志》的论文“大地伦理学”中指出：“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为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学者福格特在他的《生存之路》一书中，论述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指出人类必须采取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控制人口，二是恢复资源。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使用农药导致人体健康受损的追踪研究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关于农药的使用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以及人必须与自然融洽的告诫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使公众对生态伦理学的关注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尖锐地指出，人类之所以要向大自然投放大量的农药，关键是由于人类长期以来所逐渐增强的征服自然的野心。她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力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想象中的‘控制自然’，就是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经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

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由于卡逊的书深刻揭露了工业污染所蕴含的危险性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危害，导致了政府的干预，并产生了通过立法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政治行为，真正的环境运动由此开始。所以，20世纪60年代后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可持续发展的形成时期。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人类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公害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痛苦之后，开始聚焦于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反思，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反思中初步形成。

在这个阶段，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及其两个历史性文件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起到历史性推动作用。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一个里程碑。来自11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讨论地球的环境问题。大会通过了两个著名的文件。一个是《人类环境宣言》，另一个是58个国家152名科学家参与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多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千百万人仍然生活在远远低于温饱水平之下，他们无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以及教育、保健和卫生设施，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牢记它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改善环境的目标。……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问题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这是联合国组织第一次把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的庄严宣言。《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呼吁：“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美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的目

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的目标共同协调地实现。”

《只有一个地球》在论述人类面临危机的基础上，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深入的意见。该报告指出：“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的转折点。这未来的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遇到的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和困惑不可知性。”报告倡导以集体的责任感去发现更多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以及关于自然界同人类如何相互影响的知识。报告的主题始终是“只有一个地球”，并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国家，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培养出真挚的忠心的话，在人类社会，我们是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的。”

罗马俱乐部所倡导的全球思维对可持续发展的形成起过显著的作用。

罗马俱乐部创建于1968年，该组织认为，人类现有的制度、机构、团体及其思维方式，大多数以适合于处理纵向的、局部的、单个的事物为准则；然而现代文明却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横向的、全局的、整体的事物，要求人们以全球为研究框架，用整体的、系统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处理当代事物。罗马俱乐部就全球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报告与著作，而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产生更为直接影响的是《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

《增长的极限》通过对人类命运的五个参数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自然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

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 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 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 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 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 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 而不是第一种结果, 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些结论是如此深刻, 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以至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已被这些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所压倒。我们希望, 这本书将适合于许多研究领域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引起其他人的兴趣, 提高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的空间和时间的水平, 和我们一起理解和准备这个伟大的过渡时期, 即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①

这就是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与平衡发展的主要观点。所谓“全球均衡状态的最基本定义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 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的最低要求是: (一) 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 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二) 所有投资和产出的速率, 包括出生和死亡, 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三) 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和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②

罗马俱乐部具有针对性的、深刻的报告, 震撼了当代世界。该报告也遭到许多批评, 但各种批评都不足以削弱它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和起到的历史作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成立于 1975 年, 主要开展全球问题研

^① D. L. 米都斯著, 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9—20 页。

^② 同上书, 第 200 页。

究。它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确：一是描述现实困境，对即将到来的严峻问题进行预告；二是提出全球发展的新思路。该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他 1981 年出版的专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和开发再生能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途径。该书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他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全面论证了他所倡导的新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他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其经济发展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文化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进。西纳素对佩鲁的新发展观是这样评价的：“这种新发展观不同于以环境为根据的外来命令：它是使自由能够成为现实的各种新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观念。”^①

1980 年 3 月 5 日，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② 198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编著和出版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明确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提出。这份大纲虽然主要针对资源保护问题而没有涉及更大的领域，但从根本上改变了 60—70 年代盛行的就保护论保护的思维和做法，明确提出应该把资源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对立。1982 年 1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

①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序，转引自蔡拓《可持续发展——新的文明观》，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 页。

尔巴博在日本以《环境与发展》为题所作的讲演中强调：“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除非尽早地特别注重许多相互关系，否则不可能实现持续的发展。”^① 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自然宪章》，它指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由此，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观建立了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可持续发展共识时期。

从1987年到1992年，世界上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在当代的重要地位。

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的是1984年10月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该组织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下，经过世界各国专家整整900多天的调研，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现在国际社会公认，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权威界定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系统论述以该报告为最佳。报告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则已经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在未来，我们应该致力于走出一条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一般地考虑环境保护到强调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是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1991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报告是继《我们共同的未来》之后又一本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观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九项“可持续生存的原则”：尊重并保护生活的社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及多样性；对非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到最低程度；维护在地球的承载能

^① 转引自王伟主笔《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